本版编辑：史小今
E-mail：m2@studytimes.cn
Tel：010—62804757

世界经济

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与货币国际化

□ 管　涛

2009年我国开始跨境人民币业务试点，201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正式提出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通常认为，顺应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发展趋势，降低对美元的依赖，减少外汇储备积累，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动机。然而，用本币国际化来解决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并非完全对症下药。

国际收支平衡与本币国际化本身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

国际收支平衡是本国经济对内平衡状况在对外部门的反映。比方说，储蓄大于投资，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是经常项目顺差的主要原因；金融市场欠发达，导致对外资的过度依赖，则可能是资本项目顺差的重要原因。这些问题与用本币还是外币作为涉外经济交易的计价结算货币并无必然联系。正如，本币同样为国际化货币，日本长期经常项目顺差，美国却长期经常项目逆差；欧元为欧元区共同货币，德国长期经常项目盈余，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腊、爱尔兰等国却长期经常项目赤字。

不同路径的本币国际化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不同

上世纪中期，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用美元向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国家提供官方经济援助，西欧国家再用援助的钱从美国进口商品。这种“资本项目美元输出、经常项目美元回流”的国际循环模式，在美国贸易持续盈余的情况下，契合了“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的国际收支自主平衡格局，较好兼顾了美元国际化和国际收支平衡两个目标。日本1980年代实施的日元低息贷款的“黑字环流计划”，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当时日本为谋求更高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还采取了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开放、放宽外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支持欧洲日元离岸市场发展等措施，方便和鼓励非居民对日元资产的持有。这在很大程度上又进一步加大了资本流入的压力，助长了资产泡沫。1990年代后半期，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经济长期停滞，日元国际化水平也随之一落千丈。

以本币对外借债虽无微观汇率风险却有宏观货币错配问题

新兴市场因为存在本币不可兑换和非国际化的“原罪”，饱尝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并发的国际收支“双重危机”之苦。由此得出本币国际化的另一个好处是，如果能够以本币对外举债，由于对本国企业不存在货币错配风险且本币供给无限，因此，无债务危机之虞。但是否发生国际收支层面的债务危机，与债务持有人结构有关，而与币种无关。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以来，欧洲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南欧国家政府债务负担过重，达到GDP的100%多，远超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定下的60%以内的警戒标准。然而，日本政府的债务负担更重，达到GDP的200%多，而日本却没有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其背后的主要逻辑就是，尽管二者政府债务都是以本币计价，但南欧国家的主权债务有60%左右是非居民持有（美国该比例为40%多），属于“外债”；而日本的主权债务有90%以上是居民持有，却属于“内债”。虽然日本政府债务负担很重，但在通货紧缩和日元低利率环境下，国内投资者缺乏其他更好的可替代的投资选择，政府债券长期居于市场投资组合的重要地位，日本政府也就债多不愁。而欧洲的情况却大相径庭，虽然国内债务人的本币外债不存在货币错配问题，但国内债务人减少本币外债是因境外债权人集中减持南欧国家欧元资产引起的，这就酿成了主权债务危机。

主要结论

高度重视货币国际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总结日本“金融战败”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在国力大幅提高、经济全面开放的情况下，日本方面的相关理论准备不足、经验研究不够，决策失误，导致了日本经济金融一蹶不振的严重后果。货币国际化虽然对于新兴市场、后进国家来讲，是一件新鲜事物和全新试验，但国际上早有较为成熟的理论和丰富的实践，可以结合国情充分参考和借鉴，少走弯路。货币国际化是更高层次的金融开放，需要更加谨慎，更加注重开放的先后次序、配套条件甚至前提条件。

慎用美元作为本币国际化利弊分析的参照。美元国际化是不可复制和推广的极为特殊的个案。本轮国际金融危机肇始于美国，但借助美元是国际主要计价、结算、投资、储备货币的得天独厚的地位，美国却能够以近乎零成本从国际市场融资，用于国内危机救助。而欧元作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国际主要货币，希腊、西班牙等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国家，仍需要以惩罚性的高利率到国际市场去筹资，同时还要实施代价高昂的紧缩性财政整固计划以赢取市场信心。因此，美元是独一无二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货币，而欧元、英镑、日元等国际化货币只是次中心货币，其他不可兑换货币是外围货币。

行使国际货币职能时本外币是等价的。国际收支是居民与非居民一切经济交易记录的总和，它并不区分是用外币还是本币作为计价结算货币。本币只要是采取“经常项目输出、资本项目回流”的国际循环模式，就会扩大本国对外负债，增加资本流入；只要是采取“经常项目回流、资本项目输出”的循环模式，就会扩大本国的对外资产，增加资本流出。同理，本币国际化越进入投资、储备货币的较高层次，也就意味着非居民持有的本币资产增多，本币国际化就会增加而非减少资本流入的压力。经常项目尤其是货物贸易顺差，是一些货币迈向更高台阶国际化的主要障碍。1960年代，西德和日本对于本币的国际化一直比较抗拒，就是因为担心马克和日元的国际化，有可能影响出口竞争力，进而减少贸易顺差。

本币用于计价还是结算的经济与政策涵义大不相同。如果将本币用于对外贸易和投融资活动的计价货币，则真正有助于本国企业规避汇率风险，降低对美元的依赖。但如果计价仍然用美元，而结算用本币，则本国企业依然承担了汇率风险，而更多是一种企业套利行为。这种套利行为，有助于拉平境内外的汇差，促进境内外市场汇率趋于一致，但也会加剧跨境资本的顺周期流动，进一步影响国际收支平衡、汇率稳定。如果汇率缺乏弹性，那么捍卫本币汇率必然是以抛售外汇储备为代价，而不可能是抛售在岸的本币。美元国际化的另一个重要经验是，战后初期，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安排，确立了美元的国际地位。1970年代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美国又借两次石油危机建立了石油能源交易以美元计价结算的安排，通过美元与石油交易挂钩重新巩固了美元的国际地位。由此可见，要使本币国际化走得更远、更扎实，创造出基于满足实际交易而非单纯财务管理需要的本币计价结算需求方为王道。

热点透析

提高国际能源安全话语权

□ 惠春琳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可以说，没有能源安全，就没有经济安全，没有经济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我国在现阶段的发展过程中，能源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十三五”规划18次提到能源。

我国国际能源安全话语权缺失

传统意义上的能源安全主要指的是石油安全，具体来说，就是要确保一个国家拥有稳定的石油供给（油源）、安全的石油通道（油路）和平稳的石油价格（油价）。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尤其是对中国而言，能源安全至少还应该包括两大要素，即能源消费与环境的关系，以及我国在国际能源安全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在确保能源安全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首先，我国能源供给能力大幅提高。2014年，全国能源生产总量为36亿吨标煤，比2000年增加了22.5亿吨，增幅为167%。其次，节能环保成效显著，“十一五”以来，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了21%，全国平均供电标准煤耗下降到321克/千瓦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环保达标改造已近尾声，在能源领域的话语权有所提升。再次，虽然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依然以煤为主，但是清洁能源的占比比十年前上升了7.9个百分点。其中可再生能源的消费量十年前仅为90万吨油当量，到2014年增加到5400万吨油当量，增长60倍，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有助于降低排放。最后，科技水平不断提高。我国特高压输电技术居世界领先水平，并且已经拥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等等，为未来新能源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在能源领域，我国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我国在能源安全的五个方面都缺乏一定的话语权。

油源方面。我国对中东、北非的石油依赖度分别高达50%和30%，而中东北非地区又是全球治理失败比较集中的地方，政治腐败，社会动荡，都为中国能源供给埋下了诸多隐患。最近，中东局势日趋复杂，且变化莫测，在反恐事务方面，很多国家开始倾向于俄罗斯，俄罗斯和欧洲结盟似大势所趋。如若如此，未来中东北非事务将有可能会从美国主导转变为俄欧共同主导，这不但对我国的能源供给不利，还会影响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进行。

油路方面。我国已经形成了四大方向的能源通道网络，包括东北方向的中俄油气通道（陆上），西北方向的中国—中亚油气通道（陆上），西南方向的中缅油气通道（陆上），以及海上油气运输通道。四个方向中，海上运输量达到85%以上，陆上不到15%。未来30到50年之间，海上能源运输通道占主导地位的局面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但是，我国海上运输通道严重依赖“马六甲海峡”，并且有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包围，我国尚无法有效控制周边海峡，能源通道存在安全隐患。

油价方面。全球共有三个石油期货市场，五个现货市场，两个基准油价，分布很不均匀，中国一个都没有。鉴于石油越来越凸显的金融属性，可以考虑尽快建成上海原油期货市场，以期能在一定程度上稳定石油价格，提高我国在石油定价机制方面的话语权。我国是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对于石油的价格却没有丝毫话语权，只能望价兴叹。

能源消费与环境的关系方面。我国的能源强度高，能源利用率低，能源开采和消费比较粗放，生态环境和地下水资源也遭到了一定的破坏。2006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二氧化硫排放2200万吨。大气污染愈加严重，雾霾天气大范围频繁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损我国在气候谈判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主导权方面。我国不但在油源油路油价方面缺乏一定的主导权，而且在能源技术引领方面，以及在排放标准方面，总体来说都缺失与我国体量相匹配的话语权。

对策建议

发动能源技术革命，降低能源强度，提高能源利用率，减少能源消费对环境的破坏。2014年6月13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召开，研究我国能源安全战略。会议强调，要确保我国能源安全，需要四个革命和一个合作，即推动能源消费、能源供给、能源技术和能源体制革命，和能源对外合作。在四个革命中，最为重要的是技术革命。人类对于能源的使用，经历了薪柴时代、煤炭时代、油气时代，未来会进入新能源时代，技术创新伴随着每一次时代的变迁。因此，通过能源技术的创新，不但可以降低能源强度，提高能源利用率，还可以在新能源时代夺取技术制高点，引领未来能源的发展方向。笔者认为，美国之所以在能源领域拥有绝对话语权，与其技术创新密切相关。无论是过去核能的发明，还是现在的页岩气革命，对整个国际能源格局，乃至于国际经济格局，地缘政治格局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际能源署（IEA）的首席经济学家法提赫·比罗尔（Fatih Birol）称：“美国油气产业复兴带来的冲击是二战以来全球能源领域的最大变革。”而页岩气革命是由页岩气开发技术的突破为前提的。

积极推动能源对外合作，将能源合作纳入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规划中。世界十大油气出产国中，分别有六个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我国十大原油进口国中有六个都是带路沿线国家。所以，有很多西方学者说，一提到“一带一路”，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能源，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在推动能源对外合作中，不但要重视与能源储产国之间的合作，更加要注重多边合作。我国目前还不是国际能源署的成员国，也不是一些重要能源多边组织的成员国，积极寻求加入这些多边组织，有助于提高我国在国际能源领域的话语权。

积极参与国际能源治理。目前，我国能源安全存在“马六甲困局”。虽然有学者认为“马六甲困局”是个伪命题，理由是，不但中国依赖马六甲海峡，日本和韩国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度也很高，所以马六甲海峡不会被封闭，也就不存在“马六甲困局”。但是笔者认为，“马六甲困局”不在于海峡是否被封闭，而在于海峡目前同时受到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双重威胁，尤其是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比如海盗和恐怖主义袭击，这类威胁的解除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难以实现，需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切入点，积极参与周边、区域与国际能源治理，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治理效果越好，公共产品质量越高，我国在能源领域的话语权就越高。

将中国标准注入国际能源安全体系中。目前我国制定的排放标准已经达到世界先进发达国家的排放标准，但是在对外合作谈判中，只以世行和欧盟标准为准。这大大降低了我国的国际谈判能力，即使我们采用的本国标准多么高，都不被国际社会采用。如果能将中国标准注入国际能源安全体系中，则会大大提高我国在能源安全体系中的主导权。

环球瞭望

“伊斯兰国”如何敛财

□ 梁　慧

自从2015年11月24日土耳其两架F-16击落俄罗斯苏-24战机之后，俄土双方就一直在互相指责，说对方与“伊斯兰国”勾结，暗地里倒卖石油。口水战持续升级，甚至到了互相亮出“证据”的阶段。不论谁是谁非，“伊斯兰国”的资金链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焦点。

几乎就在俄土争端爆发同时，“伊斯兰国”通过网络发布最新宣传片，其中对目前所控制的范围这样描述：相当于“一个英国、八个比利时、三十二个卡塔尔”。在这样广阔的范围内保持“国家”建制，以每人每月300至500美元的薪水，供养一支五六万人左右规模的武装部队，与此同时，还要负担武器装备的保养、购买，维持控制区基本生活服务，后勤、教育、行政、卫生、宣传等各类事务经费，等等。可想而知，为了维持这样一大笔日常开支，“伊斯兰国”需要怎样雄厚的资金支持。

汤森路透2014年10月发布的《伊斯兰国：经济基础上的恐怖主义资金》报告显示，“伊斯兰国”目前年收入高达29亿美元，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富裕的恐怖组织。主管恐怖主义金融情报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大卫·科恩认为，“伊斯兰国”与传统恐怖组织敛财方式有很大不同：传统上恐怖组织主要依靠国际资金转移募集资金，而“伊斯兰国”更多是“就地取财”，依靠其控制的广阔区域，资金来源方式多样、渠道广泛，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

石油走私

“伊斯兰国”所控制的叙利亚东北部及伊拉克西北地区，分布着不少重要油田。在2014年“伊斯兰国”势力范围扩张至最大面积时，仅在叙利亚境内就掌握7个重要油田，其中包括该国最大的阿尔·奥马尔油田；而在伊拉克尼尼微、安巴尔、萨拉赫丁及基尔库克四省，“伊斯兰国”控制的油田多达13个。两地合计，“伊斯兰国”最多曾控制叙利亚60%的原油产量以及10%左右的伊拉克原油产量，每天产能在8万桶至12万桶之间。再加上“伊斯兰国”往往以低于市场价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的价格出售，因此，美国政府估算，仅石油走私一项，“伊斯兰国”每日就能进账200万美元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北部的石油走私并非首创，早在萨达姆时期，这一地区就已遍布石油走私网络，原油抽取与运输分工合作。在“伊斯兰国”崛起之后，这一网络变得更加发达。由于价格低廉，“伊斯兰国”的石油走私并不缺少买家，经由中间商转手，流向土耳其、叙利亚，甚至伊朗石油市场。由于“伊斯兰国”保留了大部分熟练工人，仅在领导层用自己人替换，因此，对整个石油开采及走私流程驾轻就熟。

不过，2014年国际社会加大对“伊斯兰国”控制区空袭力度之后，该组织的原油走私受到较大影响。国际能源组织（IEA）月报显示，“伊斯兰国”原油产能一度降至2万桶/天。尽管如此，石油走私仍被认为是“伊斯兰国”最主要、最稳定的财源之一，根据汤森路透估算，石油走私在该组织的总收入中占比为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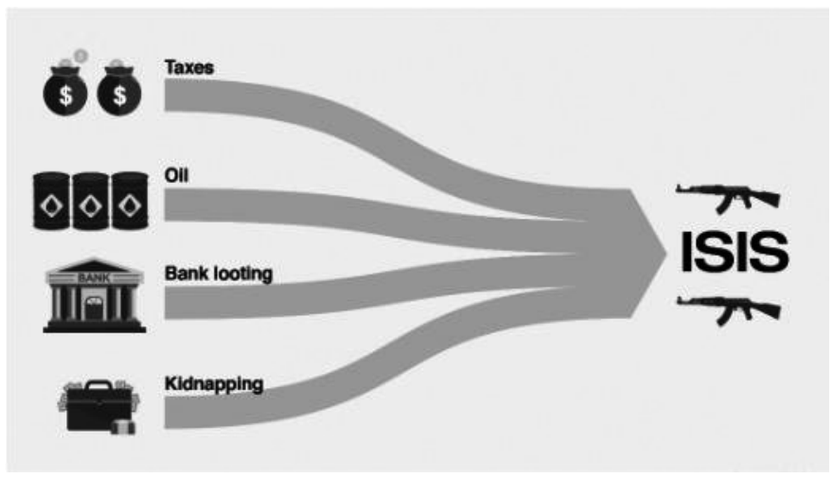
掠夺自然资源

除石油外，伊斯兰国还对天然气、磷酸盐等自然资源进行掠夺。伊拉克已探明天然气储量为3.2万亿立方米，占世界已探明总储量的1.7%，居世界第十位。伊拉克境内最大的阿卡斯天然气田位于西部安巴尔省，这一地区是当地逊尼派穆斯林居住区，也是“伊斯兰国”较早控制的地区。在安巴尔省，同样被“伊斯兰国”控制的还有阿卡沙特磷酸盐矿，年产量100万吨。根据当地天然气及磷酸盐开采公司估算，“伊斯兰国”每年从这两项资源当中获利分别为4.89亿美元及5000万美元。

农作物也被“伊斯兰国”用来交易。“伊斯兰国”占领的伊拉克尼尼微省和萨拉赫丁省，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冲积平原，土地肥沃，是伊拉克主要农产区之一。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估算，目前“伊斯兰国”已控制伊拉克境内40%的小麦生产和53%的大麦生产。农产品被“伊斯兰国”拿到黑市交易，凭借低于市价约50%的特价，销路极好。仅这两种农产品交易，“伊斯兰国”每年获利就在2亿美元左右。

抢劫金融机构

2014年6月，“伊斯兰国”占领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直接控制伊拉克中央银行摩苏尔分行，获得4亿5千万美元资产。专注于研究恐怖组织资金来源的网站“金钱圣战”（Money Jihad）认为，这是“伊斯兰国”壮大发展的一个关键性节点，并由此超过塔利班、“基地组织”等，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恐怖组织”。值得一提的是，“伊斯兰国”在摩苏尔银行并非一次性抢劫，而是继续维持该行的正常交易和运营，这对世界金融体系产生威胁。



占领区敲诈、勒索及税收

“伊斯兰国”内部有着极为严格的管理机制，其中也包括财务管理。每一个下层单位，都需要向上级缴纳其20%的收入。在城市内部，各级机构收入主要靠税收、敲诈及勒索。伊斯兰国对占领区所有工商企业、各项商业活动都征收重税，包括：商品交易税、电信公司运营税、银行取现税、工资税、路税、边界往返税（每辆卡车过关需缴纳800美元）、异教徒税（吉兹亚）等等。仅在摩苏尔，每月税收就有800万美元，而在“伊斯兰国”全部占领区，每月税收合计约为3000万美元。

绑架人质获取赎金

绑架人质从而获取赎金，是“基地组织”、塔利班等传统恐怖组织获取资金的主要手段之一，也被“伊斯兰国”所继承。“伊斯兰国”绑架人质对象不仅仅是欧美国家，亚洲的日本、中国等地，甚至同为伊斯兰国家的土耳其也有遭到绑架者。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担心支付赎金将引起更大规模的绑架出现，始终拒绝向恐怖组织支付赎金，但这并不妨碍很多国家通过部落长老、慈善组织等中介，向“伊斯兰国”赎买人质。德国《焦点》周刊曾报道称，法国政府经由土耳其情报人员向“伊斯兰国”转交1800万美元，希望后者释放4名法国记者，但法国政府对此予以否认。通过绑架赎金，“伊斯兰国”平均每月可进账约1000万美元。

海湾国家富人捐赠

与绑架人质类似，来自海湾国家同情甚至支持所谓“圣战”的富人捐赠，也是恐怖组织传统财源之一。沙特、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等国一直被认为是“伊斯兰国”的主要资助者，目前尚无证据证明这些国家政府层面的资助，但来自这些国家的富人以个人名义资助恐怖组织，这种说法被广泛认同。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国家，从叙利亚内乱之初起，即对同属逊尼派的叙利亚反对派给予资金支持，目的是推翻什叶派的阿萨德政府。

事实上，自“伊斯兰国”前身起，即“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时期，就一直接受海湾国家富人援助。不过，对该组织而言，富人捐赠在其财源中所占比重较小，美国国防部资料显示，在2005至2010年间，这一项收入仅占该组织总收入的5%左右。

除上述资金来源外，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伊斯兰国”的敛财行为至少还涉及文物倒卖、人口贩卖、武器售卖甚至人体器官交易等。总而言之，与以往的恐怖组织相比，“伊斯兰国”不但掌握更加巨大的资金，其敛财手段也更为丰富，这给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造成更大困难。